



西遊記發微

文史哲大系09

劉蔭柏◆著





西遊記發微

文虎附七編

四庫全書



文史哲大系 92
劉 蔭 柏 著

西遊記發微

文津出版社 印行

西遊記發微 / 劉蔭柏著. -- 初版. -- 臺北市
：文津，民84
面；公分. -- (文史哲大系；92)
ISBN 957-668-323-8(平裝)

1. 西遊記 - 評論

857.47

84009277

⑨2 系大哲史文

西遊記發微

著者：劉蔭柏

發行者：邱家敬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二九四巷一號

郵政劃撥：〇〇一六〇八四一〇號

電話：三六三五〇〇八・三六三六四六四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五八二〇號

定價：新台幣二〇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初版

目錄

□ 1 □ 目錄

第一章	吳承恩及創作《西遊記》的時代	一
第二章	《西遊記》成因考	一五
第三章	《西遊記》人物論考	四一
第一節	唐僧論考	四一
第二節	孫悟空論考	五七
第三節	豬八戒論考	七五
第四節	沙僧論考	八五
第四章	《西遊記》與宗教、文學藝術之關係	九一
第一節	《西遊記》與佛教	九一
第二節	《西遊記》與道教	一一一
第三節	《西遊記》與寶卷	一三〇
第四節	《西遊記》與戲曲	一四九

第五節 《西遊記》影響嬗變·····	一六三
第五章 《西遊記》的激進思想和侷限·····	一七五
第六章 《西遊記》的藝術特色及影響·····	一九一
第七章 《西遊記》明清兩代出版史考·····	二一五
(附錄) ·····	二二七
《西遊記》續書及作者考·····	二二七

第一章 吳承恩及創作《西遊記》的時代

《西遊記》是一部偉大的神話小說，其內容之豐富，氣魄之宏偉，不但在中國古典小說中獨步，就是在世界文學史上亦罕有匹敵者，兼以它的語言幽默、詼諧，在說說笑笑的談神志怪之中，常常透露出對人世間冷峻的見解，故幾百年來一直為人民所喜愛，以致其中人物早已成為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的了。

《西遊記》的作者為誰？在今天還提出這個問題似乎是可笑的，因為現在稍有文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它的作者是明代中期的偉大作家吳承恩。但是，吳承恩作為此書的作者，並不是很容易被人們認識的，而長期以來曾被誤以為是別一毫不相關的人，即邱長春。

邱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今屬山東省栖霞縣）人，生活於宋末元初之際，為全真教創始人王嘉的高足弟子，道教全真道北七真之一。王嘉死後，他潛修於龍門山，形成龍門法派。著有《攝生消息論》、《大丹直指》、《磻溪集》等書。元太祖成吉思汗派人詔邱處機，他率十幾個門徒，「歷四載」、「經數十國，為地萬有餘里」，始達雪山。他屢勸成吉思汗，「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為治之方」，「以敬天愛民為本」。成吉思汗「深契其言」，尊其為「仙翁」。（詳見《元史·釋老傳》，在《金蓮正宗記》亦

載）其門人李志常作《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卷敘其事跡，現存《道藏》中。一者因為《西遊記》的幾種明代刻本均未署吳承恩之名，二者因為這兩部書同名，後人遂不免混為一談。清初西陵殘夢道人汪澹漪箋評刊刻《西遊記證道書》一百回本時，在卷首增添一篇元人虞集《西遊記證道書原序》，以為邱長春作，並謂得古本（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於是「不根本之談乃愈不可拔也」（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直至清末學術界都未弄清楚。李志常之《西遊記》，不足二萬字，純係旅遊見聞錄，並不是小說。在清抄本《四部備要》史部及《榕園叢書》乙集和《叢書集成》初編中《長春真人西遊記》中序文，唯有西溪居士孫錫序，並無虞集序，在三種刊本此書後收有清人錢大昕、徐松、程同文、董祐誠寫的四篇跋及段玉裁、張穆兩則附語。錢大昕在跋文中談到《長春真人西遊記》與小說事，指出《西遊記》小說「乃明人作，蕭山毛大可據《輟耕錄》以為出處機之手，真郢書燕說矣。」另外，在虞集《道園全集》中亦無《西遊證道書原序》一文。故知所謂元人虞集序文乃清人偽作，或許即出於汪澹漪，黃太鴻輩自撰，亦金聖嘆之故技耳。最早記載《西遊記》作者的是吳承恩的是明天啓《淮安府志》卷十九《藝文誌》一《淮賢文目》，吳承恩的同鄉學者吳玉搢，在一七四六年參加《山陽縣志》纂修工作時，發現此項記載，他在撰寫《山陽志遺》時還進一步確考：

天啓《舊志》列先生為近代文苑之首……及閱《淮賢文目》，載《西遊記》為先生著。……書中多吾鄉方言，其出淮人手無疑。

而比吳玉搢生得還早的清初學者黃虞稷，他在一七〇〇年以前編著的《千頃堂書目》卷八頁

十三下著錄著：「吳承恩《西遊記》」，但不曉何故卻把它列入「輿地類」。

吳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先世漣水（今屬江蘇省漣水縣）人，後徙山陽（今屬江蘇省淮安縣）。曾祖吳銘，為餘姚訓導；祖父吳貞，任仁和教諭。「兩世相繼為學官，皆不顯」。父吳銳，四歲喪父，由母梁夫人領取山陽故土居住，因「家世儒者，無資，且顛沛宦遊，歸益貧」，以致「社學先生不教先君書」，吳銳娶徐氏，「徐氏世賣采縷文縠」，銳「遂襲徐世業，坐肆中」，成為小商人。徐夫人只生「一女承嘉，適同郡沈山」。因為無子，吳銳壯歲納張氏為側室，生吳承恩。吳銳因家道不富，常為下吏所欺壓，「侮之，不應亦不怒」，「木訥遲鈍」以避禍，人稱「痴翁」。其實他並非麻木不仁者，他有理想，有識見，亦有剛正之血氣：「愛玩群籍」，「自六經諸子百家，莫不流覽」，「譚說史傳，上下數千載，能竟日不休。每讀書至屈平見放，伍大夫鴟夷，諸葛孔明出師不竟，周子隱戰歿，岳鄂武穆死詔獄，未嘗不流淚也」。又「好譚時政，意有所不平，輒撫几憤惋，意氣鬱鬱云」。（《先府君墓誌銘》）

吳承恩就出生在這樣一個由書香門第衰落而為小商人的家庭，並深受其影響。他在《禹鼎志》序中自述道：

余幼年即好奇聞，在童子社學時，每偷市野言稗史，懼為父師訶奪，私求隱處讀之。比長好益甚，聞益奇。迨於既壯，旁求曲致，幾貯滿胸中矣。嘗愛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輩所著傳記，善模寫物情，每欲作一書對之，懶未暇也。

由此可見吳家藏書很豐富，他從小受喜歡博涉群籍的父親熏陶，又酷好唐人傳奇小說，創作

慾望很強烈，但遺憾的是《禹鼎志》這部短篇志怪小說集已散佚，從書名和序文所敘臆測，其中定有不少描寫大禹降伏水怪、山妖的神話傳說，成為《西遊記》中某些情節的雛型和試筆。

吳承恩性敏多慧，「甫周歲未行時，從壁間以粉土爲畫無不肖物；而鄰父老命其畫鵝，畫一飛者，鄰老曰：『鵝安能飛？』汝忠仰天而笑，蓋指天鵝云。鄰父老吐舌異之，謂汝忠幼敏，不師而能也」。吳承恩很有繪畫的天才，「舐筆和墨，間作山水人物，觀者以爲通神佳手」，但「弱冠以後，絕不落筆。家四壁立，所藏名畫法書頗多。人謂汝忠於王方慶之識書，張弘靖之聚畫，侔諸秘府者可十一焉。」（陳文燭《二西園續集》卷一《花草新編序》）「髫齡，即以文鳴於淮，投刺造廬乞言問學者恆相屬（吳國榮《射陽先生存稿跋》）。吳承恩少年時即受到才子朱凌溪、徐中行和本鄉名士蔡昂的讚賞，「朱公愛之如子，謂汝忠可盡讀天下書，而以家所藏圖史分其半與之」（《花草新編序》）。後在淮安龍溪書院肄讀時，又深受知府葛木（卮山）和講學老師胡璉、王鳳靈的賞識。葛木對吳承恩感情很深，影響較大，他經常勸勉承恩進取功名，成爲封建社會正統的合格的人才，以致承恩在三十多歲赴南京應舉落第後的第二年作《祭卮山先生文》中悲慟而又慚愧地說：

痛嗟哉卮山先生！痛嗟哉卮山先生！昔人有言：感恩易爾，知己實難。承恩淮海之豎儒也。迂疏漫浪，不比數於時人，而公願辱知之。泥塗困窮，笑罵胥至，而公之信僕，甚於僕之自信也。……碌碌人中，塵土如舊，我實負公，其又何言，自今以往，亦願努力自飭，以求無忝於我公知人之明，庶他日少有所樹立，亦卮山公

門下士也，持此以報公而已。^①

吳承恩「博極群書，爲詩文下筆立成，清雅流麗，有秦少游之風。復善諧劇，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天啓《淮安府志》）承恩有蓋世之奇才，久欲效力於明室，匡世濟時，因「一意獨行，無所拔援附麗」（李維楨《吳射陽先生集選敘》），竟一生不得榮顯。在嘉靖二十三年吳承恩約四十三歲時中歲貢，之後十幾年間又參加了三、四次考試而「屢困場屋」，不得拔擢。大約五十一歲時，吳承恩肄業於南京之南監，故有「太學吳子汝忠」之稱（潘垣《淮郡文獻志序》）。在嘉靖三十四年吳承恩五十二歲時，他少年時的好友沈坤組織「狀元兵」抗擊倭寇，「率衆力戰。身犯矢石，射中其酋，倭始退」（清·丁晏《重修山陽縣志》卷二十一《雜記二》）。沈坤常到吳承恩處談方略，承恩亦參與軍機。次年，吳承恩爲浙江總督胡宗憲撰寫《賀總制梅林胡公奏捷障詞》，打算投筆從戎依宗憲幕而未成。又因母親老邁，家境清寒，不善於謀生，吳承恩在六十多歲時赴北京候選，想求得一官半職，「僅以貢爲長興丞」（《花草新編序》）。長興縣屬浙江省，縣丞是知縣的助手，爲正八品的小官吏，與主簿「分掌糧馬，巡捕之事」（《明史·職官志四》）。吳承恩在長興任上的生活很不如意，故在《春曉邑齋作》詩中悽然詠嘆云：

悠悠負夙心，作吏向風塵。

家近遲鄉信，官貧費俸金。

大約做了一年半的縣丞，爲徵糧事得罪長興大豪，被誣爲貪贓，與一攝令都被察院訪拿，撤職罷官。吳承恩被解除繫獄罪後，有「荆府紀善之補」（吳國榮《射陽先生存稿跋》），此

是安置閑散人員，掛名拿乾俸，或對臧吏從輕處理的一種安排。大概案情不久即弄清，吳承恩得到名譽的補償，便退官回淮安，並未去湖北赴任。此後，吳承恩放浪詩酒間，以賣文、經商爲生，終老於林下，未能在仕途、政業上「有所樹立」，含恨而逝。吳承恩結識的權貴有：胡宗憲、李春芳、高拱、徐階、趙文華等人。結識的社會名流有：文徵明父子、徐中行、何良俊、歸有光、沈坤、朱曰藩、陳文燭、黃姬水等人。

吳承恩因「家貧無子」，逝世後「遺稿多散失」，後由宦歸的表外孫丘正綱「收拾殘缺，分爲四卷，刊布於世」（同治《山陽縣志》卷十二《人物志二》），即《射陽先生存稿》。同鄉好友陸遙收其遺文，張清溪、馬竹泉手錄其遺稿。晚輩吳國榮、張以衷、蔡翰臣參加了整理出版《射陽先生存稿》的校刻工作。此書在清初時「刊版不存」，吳玉搢「初得一抄本，紙墨已極渝敝，後陸續收得刻本四卷，並《續集》一卷（《山陽志遺》四），這是最完備的本子。後來，不僅《續集》不見了，四卷刻本亦難尋到。至乾隆四十二年（公元一七七七年），吳進僅見到一殘本，遂從中錄出古文十六篇刊世，即《射陽先生文存》。一九二九年，從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發現原刻本《射陽先生存稿》四卷，一九三〇年鉛印問世。至於吳承恩的巨著《西遊記》小說，則是在他仙逝約十年後由他的老友李春芳託名華陽洞天主人校訂出版的②，即明代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金陵世德堂刻華陽洞天主人校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二十卷一百回。但此刻本中未署作者吳承恩的大名，於是給後人平添了不少麻煩，亦使吳承恩在幾百年間名字不顯，這的確是不應該的。

吳承恩雖一生悵鬱，未能在政治上奮進，卻是一位長壽的文人，他活了八十多歲，歷經

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慶）、神宗（萬曆）五個朝代，正所謂五朝弊政皆親歷，壯志功名未遇時。吳承恩生活的年代，正是明代中衰時期，帝王荒淫無恥，昏庸腐敗，朝廷權奸握柄，朋黨林立、互相傾軋。在中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大閹黨，都產生在這個時代。如弘治年間的李廣、蔣琮、正德年間的劉瑾、萬曆年間的馮保均為閹臣，其中尤以劉瑾的閹黨氣焰最凶，以致北京城內外流傳有兩個皇帝：一個坐皇帝、一個立皇帝；一個朱皇帝，一個劉皇帝。（詳見張萱《西園聞見錄》卷一〇〇《內臣》）嚴嵩是嘉靖年間大權奸，嚴嵩父子曲意媚上、貪鄙奸惡，竊權弄柄，當時一度握過大權的夏言、徐階等人，亦非善類。此外，自明英宗之後，朝野黨系之爭一直很激烈，如英宗時吏部尚書王翱是河北鹽山人，他反對南士，多引用北方人（《明史·王翱傳》）；後來浙江桐廬人姚夔任吏部尚書，則排斥北士，多引薦南方人（《明史·姚夔傳》）。武宗正德年間，內閣大學士焦芳是河南泌陽人，他深惡南士，每退一南人就高興，甚至連談論古人時亦借題發揮大罵南人，他還作了一幅南人不可為相圖送給劉瑾以為鑒戒（《明史·焦芳傳》）。甚至連明代後期的東林黨亦有地方鄉土因素。難怪清世祖順治在與朝中漢臣談話時指出，北人南人各自為黨，把明朝搞壞了（《順治東華錄》二三）。

在明代皇帝中，武宗特別荒淫好色，他除了立「豹房」令四方獻美女供其淫樂外，還常常帶兵外出，四處尋歡作樂，「凡車駕所至，近侍先掠良家女以充幸御，至數十車」（清·毛奇齡《明武宗外紀》），又「遍入寡婦、處女家，掠以出，號哭震遠近」（《明史·谷大用傳》），以致每逢他臨幸「（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市肆蕭然，白晝戶閉」（

《明武宗外紀》。世宗不僅窮奢極欲，多次大選宮女供其淫樂，還想吃仙丹靈藥，長生不老，於是「一時方士如陶仲文、邵元節、藍道行之輩，紛然並進，玉杯牛帛，詐妄滋興」，或被封爲真人、國師，獲取高官厚位，或受賜莊田、金銀，享受優厚俸祿。他們出入皇宮，深入禁地，「口銜天憲，威福在手，天下士大夫靡然從風」（《明史·佞倖傳》）。世宗從小就崇道，天天往西苑煉丹修道，自「壬寅宮變」，幾乎被宮女勒死之後，自稱爲塵世外之人，移居西苑，奉玄修道，不視朝了。而道教得勢，佛教即受排斥，這些隆貴的真人、國師，在《西遊記》中留下他們的暗影。當時，以顧憲成爲首的一批比較正直的知識分子，抨擊朝政，力圖革新，結果被殺、被囚、被貶，更兼以東、西廠、內廠以及錦衣衛編織成龐大的特務網，到處出沒，殘害無辜，很多人往往因爲一言半語獲罪而橫遭虐殺。《西遊記》中祭賽國之錦衣衛，車遲國之「四下里快手又多，緝事的又廣，憑你怎麼也是難脫」的情景，正是對明代社會的揭露。監禁、酷刑、苛稅幾乎威脅著社會各階層人的生存，那冷酷險惡的政治氣流，不消說是普通的百姓，就是士林亦噤若寒蟬。

吳承恩就生活在這黑暗、沈滯、恐怖的時代，他親眼看到整個社會：

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機械日繁，奸詐之風日競（《贈衛侯章君履任序》）

所以他憤憤地說，這是「群魔出孔竅，白晝搏人繁聚嘯」，「坐觀宋室用五鬼，不見虞廷誅四凶」（《二郎搜山圖歌》）。並尖銳地指出，這惡濁的現實，「匪獨天數也，人亦與有責焉」（《送郡伯古愚邵公擢山東憲副序》）。

吳承恩生活的年代，亦是明朝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異常尖銳激烈的年代。封建統治者的

暴虐，土地的兼併，賦稅的加重，以及無休止的巧取豪奪，致使經濟破壞，天災人禍到處出現。皇帝、王公、勳戚、宦官所設的莊田數目之多，超過了以前任何時代。弘治時京畿皇莊五座，占地一萬二千八百餘頃，至正德即位，一月之間增添七座，以後增至三十六座，占地共三萬七千五百餘頃。王公、勳戚、宦官掠奪土地更普遍成風。弘治二年，順天府的各項莊田共計三百三十二座，占地三萬三千餘頃。至正德十六年，蔓延至北直隸的莊田已達二十萬九百餘頃。朝中大臣，地主官紳兼併土地亦有加無已。如嚴嵩在北京附近就有莊田一百五十餘處，又「廣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明史·鄒應龍傳》），至於他的原籍袁州一府四縣之田，十分之七都被他家侵占。再如徐階在江南占田達六萬，江西安遠葉占田達八萬。（參看翦伯贊主編《中國史上綱要》中冊）在掠奪、兼併土地的過程中，還強奪民產、燒毀房屋、鏟平墳墓、砍伐樹木，甚至隨意傷人、害人。（李夢陽《論三害》）再加上官僚貪污成風和軍費支出龐大，造成了明朝財政上的極大困難，政府「每年所入二百萬之額，不能充所出之半」，嘉靖三十年明朝政府於南畿，浙江省州縣增賦百二十萬，叫作「加派」。嘉靖三十六年又在江南等地增役銀四十萬，叫作「提編」。以後又出現箕歛、派括、算稅契、折民壯等等「加派」的名目。（詳見《明史·食貨誌》）地主豪紳持各種特權可以免賦免役，而廣大的農民生活困苦不堪，稅務、債務如牛負重，大小規模的舉事在各地不斷暴發。據《明史》、《明史紀事本末》、《明武宗正德實錄》、《罪惟錄》等史書上記載，僅在明武宗正德年間，比較大的農民舉事就有：山東的劉寵、劉宸；四川的方四、曹甫；江西的王鈺五；河南的師尚詔和廣州的曾一本。除去上述農民舉事外，還多次發生城市居民的

暴動。雖然這些舉事和暴動，先後都被正德的屠刀所鎮壓，但仍沉重地打擊了明王朝的統治，加速其滅亡，顯示出人民群眾潛在的偉大力量。吳承恩生活在這樣的年代，又一直處於社會中、下層地位，很可能結識過一些江湖豪傑，耳聞目睹過一些農民舉事的動人事跡，儘管他為封建正統思想所囿，沒有公開表示過對這些「草莽英雄」的同情，如李贄之讚林道乾（見《焚書》卷四《因記往事》），但在嚴肅的現實面前，有正義感的作家吳承恩，不能不激起某種同情，甚至共鳴，這在塑造《西遊記》中孫悟空形象時留下他感情的痕跡。在這社會衰敗的景象中，又連年遭到外族入侵和倭寇掠搶，戰火不息，民生塗炭。當時，北方有達延汗之孫俺達汗的戰爭威脅，東南沿海有倭寇騷擾。明朝中期蒙古瓦剌衰落，韃靼部乘勢興起，韃靼達延汗統一了蒙古各部。嘉靖三十二年達延汗死，其孫俺達汗勢力獨盛（在《明史·武宗紀》中稱「小王子」），他屢次率兵侵入內地。因為明朝邊將把「諸邊軍糧百萬，強半賄嵩」（《明史·丁汝夔傳》），以致軍士飢疲，邊防大壞，在嘉靖一朝內竟出現了韃靼兵三逼京師的嚴重情況，在東南沿海，倭寇自十四世紀就開始侵掠，因在明成祖永樂年間遼東望海渦戰役中，被明朝總兵劉江率領的軍隊一舉全殲（詳見嚴以簡《殊域周咨錄·日本》），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倭寇不敢進行大規模的騷擾。待到明世宗嘉靖時，倭寇因與沿海豪強富商勾結，有了內應，復又猖狂起來。明朝派朱軾為浙江巡撫，兼督備倭，他到任後逮捕了一部分與倭寇有關係的地主富豪和奸商，又積極訓練兵，堵擊倭寇，取得一些成績，不料觸動了「閩浙大姓」的利益，受其誣陷，竟致下獄，被迫自殺。（《明史·朱軾傳》）從此，「罷巡視大臣不設，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而倭寇愈加猖獗。嚴嵩當政時，其義

子趙文華奉命督視海防，傾陷御倭督臣張經，嚴嵩父子甚至私通倭寇，激起人民極大憤慨。吳承恩目睹國家多難，奸臣弄柄，正直有用之士慘遭殺戮，以致無力抵御外侮，所以在《重刻金陀粹編序》中痛悼民族英雄岳飛之死，唾罵「奸邪誤國」之秦檜，寄託自己複雜的哀思，在《平南頌》中更傾吐了他對倭寇「恃海為梗，依叢嘯凶。蹂兩浙、殘三吳」的切齒之恨。但遺憾的是，他卻將《平南頌》獻給權奸趙文華，不免大失身價，為後世人所竊笑。在《西遊記》十四回之後，描寫孫悟空在取經途中降妖除怪，恐亦有所寄託。

在吳承恩生活的時代，出現了王良、李贄那樣反對封建傳統思想，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進步思想家，他們提倡個性解放（「造命」），反對統治者過多地干擾人民，過份地用嚴刑峻法和封建禮教束縛人民。這種強調個人作用，反對和命運妥協，認為人應該有改變環境的大膽思想，對於吳承恩這顆不願受世網羈勒的心，產生了某種心靈上的共鳴，並唱出異樣的歌調。

社會黑暗沉滯，個人際遇坎坷，這不能不使才華橫溢的吳承恩，胸中激蕩著悵悶的風雷，在《二郎搜山圖歌》中，他不勝感喟地自述：

野夫有懷多感激，撫事臨風三嘆息。

胸中磨損斬邪刀，欲起平之恨無力。

而這「欲起平之恨無力」之意，不僅被他融入《西遊記》的創作之中，這憤激的情緒在其他詩文中亦時時流露。在談及自己的處境時，他不止一次地自嘲說：「承恩淮海之豎儒也；迂疏漫浪，不比數於時人」，「泥塗困窮，笑罵胥至」（《祭卮山先生文》），「春秋已壯，